



中 学 西 渐 丛 书

乐黛云 主编

孙小礼 著

莱布尼茨与中国

文 化

LEIBNIZ AND CHINESE CULTURE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 学 西 渐 丛 书

乐黛云 主编  
孙小礼 著

莱布尼茨与中国

LEIBNIZ AND CHINESE CULTURE

文 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孙小礼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7

(中学西渐丛书/乐黛云主编)

ISBN 7-81064-913-2

I. 莱… II. 孙… III. ①传统文化-中国-影响-西方国家 ②莱布尼茨  
G. W. (1646~1716)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G12②B516.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8848 号

中学西渐丛书

LAIBUNICI YU ZHONGGUO WENHUA

**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

孙小礼 著

---

责任编辑 张成水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cnuph. com. cn

E-mail master@cnuph. com. 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 092mm 1/16

印 张 14. 75 插页 2

字 数 248 千

定 价 29. 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孙小礼 女，1932年生，杭州人，曾就读于南开中学、浙大附中、贝满女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1953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数学系、物理系、哲学系和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任教。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方法论、科学与社会等。主要著作有《自然辩证法讲义》（合著，1979）、《数学·科学·哲学》（1988）、《科学方法论史纲》（1988）、《方法论》（主编，1993）、《科学技术与世纪之交的中国》（主编，1997）、《文理交融——21世纪的科学潮流》（2003）、《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主编，2004）等。



中 学 西 渐 丛 书

卡夫卡与中国文化

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

史耐德与中国文化

白璧德与中国文化

庞德与中国文化

责任编辑：张成水  
封面设计：王征发



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

## 内容提要

17世纪德国的卓越科学家和思想家莱布尼茨（1646～1716，清顺治三年至康熙五十五年）生活的年代正值我国清朝的康熙时代，那时有一批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他们把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带入中国，也陆续把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传入西方。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持续于他的一生，自20岁起至70岁逝世，始终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在17世纪末，他利用传教士的通信和报告，编辑出版了轰动欧洲的书：《中国新事萃编》，他临终前正在撰写中的一篇著作是《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

莱布尼茨希望以传教士们为媒介，积极开展中西文化交流，为此，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做了种种努力。

由于莱布尼茨是与牛顿齐名的大科学家，又是近代欧洲可与康德齐名的一位哲学泰斗，还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另一位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学者，所以他的中国观，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许多见解，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本书第一章讲述莱布尼茨一生的不平凡经历和他的主要科学成就和哲学思想。第二章至第八章按各个专题讲述莱布尼茨怎样研究中国，怎样赞扬中国文化以及怎样热心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并分析澄清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某些误读和中国人对莱布尼茨的某些误传。

## 总序

希望云

经历了 20 世纪的两 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 21 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生了 9.11 这样的恐怖袭击。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没其他民族文化；后者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西方的文化自觉首先表



现在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方面。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sup>①</sup>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有的学者不仅对上述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还进一步指出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sup>②</sup>可以说这是西方更深入、更触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觉。

如果说西方文化数百年来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自觉在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下更多地倾向于审视自己文化的危机和弱点；那么，中国文化近百年来，作为一种弱势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轻视和压抑，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就是与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种子（基因），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特点；其次，必须创造条件，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解读，这种解读融会古今中外，让原有的文化基因继续发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另

<sup>①</sup> 参见《超越全球化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见《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202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sup>②</sup> J. 里夫金：《欧洲梦：欧洲梦是如何悄悄地使美国梦黯然失色》，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2006。

外，还要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未遭遇，也全无经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近年来，西方文化显示了对他种文化的强烈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首先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认识角度和新的诠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sup>①</sup>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sup>②</sup>。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sup>③</sup>

其次，不但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里查·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sup>④</sup>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教授特别提出：“弗朗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

① 参见《迎接新的文化转型时期》，566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② 参见《迂回与进入·前言》，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③ 参见《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④ 载《文汇报》2004年7月27日。

存与相互尊重。”<sup>①</sup>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类似观点的著作还很多。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我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sup>②</sup>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发展构成了与过去的汉学（中国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反观中国，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汉学（中国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新世纪以来，出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文津出版社）等系统总结性的大型综合丛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前者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但总的说来，显然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著作较多，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专著却相对较少，尤其缺少这方面的综合性系统研

① 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文化还是文化间性：从形象学到媒介》，载2001年4月“多元之美”大会文献。

② 阿尔蒙多·尼兹：《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1），5页。

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更是几乎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荣格、白璧德、庞德、奥尼尔、色加楞、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这个过程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并不容易。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他们感到自身比较强大而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似的东西，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也就不免将异文化纳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异文化的真正特色；反之，当他们感到本文化暴露出诸多矛盾，而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又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文化，将异文化构建为自己的乌托邦。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一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

本丛书意在对这个充满着误读、盲点和过度诠释，同时又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首先是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其次是对于误读、吸收和重建等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最后上升到对两种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种种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

本丛书现包括以下5种：《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如有可能，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出相关学术著作，以期更加完善、充实。

2006年10月6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 前 言

### ——我为什么写《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

我第一次听到莱布尼茨这个名字，是在1950年，赵访熊先生讲授的微积分课上。表述微分和积分是互逆运算的微积分基本定理，也称为“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后来从科学史的书籍中知道，在欧洲的数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谁先发明微积分的激烈争论，这是历史上最为旷日持久的首创权（优先权）之争，争论的结果，人们公认：牛顿和莱布尼茨相互独立地创建了微积分。

1960年前后，我在研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时，看到书中有10处提到了莱布尼茨。除了与微积分有关的论述外，还以相当篇幅专门讲述莱布尼茨与笛卡儿这两位大思想家关于力学中的运动量度的争论；还有一处提及莱布尼茨在蒸汽机发明史上的贡献。在恩格斯眼中，莱布尼茨并不只是微积分的创建者，而且是17世纪的一位大科学家和大思想家。当时我正准备研究近代科学史，深感这位与牛顿同时代的莱布尼茨，应该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人物。1962年，我特地对那场由莱布尼茨挑起的关于运动量度的争论作了一番历史考察，将长达50多年的争论经过写成一篇专题论文，曾刊登在《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1963年1月11日）。

自1982年起，我注意到在某些报刊文章和书籍中说：莱布尼茨是受到中国《周易》“八卦”的影响才发明二进制算术的，但不知根据何在？同时也有文章提出否定的看法。这成为我此后一直关注并竭力想搞清楚的一个问题。

1986年是莱布尼茨诞生340年和逝世270年，当时的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邓东皋教授认为应该搞一点纪念活动，他建议由我来作一个介绍莱布尼茨生平事迹的报告。为了准备这个报告，我钻进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查找到不少有关的文献资料，立即贪婪地阅读了关于莱布尼茨的一些文章和著作，看到他的种种成就和他在历史上所获得的种种极高的评价，使我对莱布尼茨这个人物越发感到兴趣。我在纪念会上作完题为《莱布尼茨，卓越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的报告以后，经常关注和阅读有关莱布尼茨的资料



就成为了我的一项个人爱好。

著名的法国哲学家狄德罗 (D. Diderot, 1713~1784) 在他主编的《百科全书》中撰写了“莱布尼茨主义”条目, 其中写道: “当一个人考虑到自己并把自己的才能和莱布尼茨的才能作比较时, 就会弄到恨不得把书都丢了, 去找个世界上极偏僻的角落躲藏起来以便安静地死去。这个人的心灵是混乱的大敌: 最错综复杂的事物一进入他的心灵就弄得秩序井然。他把两种几乎彼此不相容的品质结合在一起了, 这就是探索发现的精神和讲求条理方法的精神; 而他借以积累起最广泛的各种不同种类知识的最坚毅又最五花八门的研究既没有削弱这一种品质, 也没有削弱另一种品质。就哲学家和数学家这两个词所能具有的最充分的意义来说, 他是一位哲学家和一位数学家。”<sup>①</sup>

作为一位哲学家, 他上承希腊古典哲学, 下启德国近代哲学, 是与亚里士多德、康德齐名的欧洲三大哲学泰斗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单子论和前定和谐系统; 在认识论方面, 他是理性主义传统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的许多哲学思想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位数学家, 他被认为是 17 世纪具有最高能力的数学通才。他与牛顿相互独立地创建了微积分, 在代数方面也有杰出贡献。他研制出能作四则运算的计算器, 发明了二进制算术, 还是数理逻辑这门学科的奠基人, 他首创的许多数学符号一直沿用至今。现代数理逻辑、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都在沿着他的思路前进。

虽然莱布尼茨的最著名的成就是在哲学和数学这两个方面, 然而他的兴趣极其广泛, 他的“五花八门”的研究横跨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工程技术等众多领域, 而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或多或少被载入了史册的重要建树。莱布尼茨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又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当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曾说: 莱布尼茨本人就像一座科学院。<sup>②</sup>

对于莱布尼茨,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 (V. L. Feuerbach, 1802~1872) 曾有这样的形容: “通常, 人们只禀赋有这种或那种天才; 可是, 莱布尼茨却集各种各样的天才于一身: 他既具有抽象的数学家的特性, 又具有实践的数学家的特性; 既具有诗人的特质, 又具有哲学家的特质; 既具有思辨的哲学家的特质, 又具有经验的哲学家的特质; 既具有史学家的才能, 又具有发明家的才能; 他具有很好的记忆力, 从而不必耗费精力去重读他过去记下的东西; 他既具有植物学家和解剖学家的显微镜似的眼睛, 也具有进行概括工作

① 陈修斋:《人类理智新论》译者前言:莱布尼茨及其哲学简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② 段德智选编:《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60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的分类学家的高瞻远瞩的目力；他具有学者的忍耐力和敏锐感，也具有依靠自学的、独立思考的、寻根问底的研究者的坚忍力和勇气。”<sup>①</sup>这段话很生动、很全面地描绘出了莱布尼茨的特点和形象，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是与他所具有的这些特征分不开的。

美国数学史家贝尔（E. T. Bell, 1883~1960）称莱布尼茨为“样样皆通的大师”。他说：“样样皆通，样样稀松”这句谚语，也有它惊人的例外，莱布尼茨就是一个例外；“可以说莱布尼茨不止活了一生，而是活了好几世。他作为一个外交官、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在每一个领域都完成了足够一个普通人干一辈子的事情。”<sup>②</sup>

莱布尼茨认为思想和实践是不可分离的，他曾以“理论与实践”和“在精神领域寻求清晰；在物质领域寻求效用”作为自己的座右铭。<sup>③</sup>

莱布尼茨所信守的另一条座右铭是：“每失去一时刻，生命就消失一部分。”<sup>④</sup>他勤奋无比，爱惜时间如同爱惜生命。他每时每刻都在读着、写着、思考着，在任何场所、任何条件下都能研究和写作，他的许多传世之作就是在各种旅途中，在颠簸的四面透风的马车里，用各式各样的纸张，甚至是在一些纸片上写成的。

莱布尼茨曾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条人生体会：“一切容易的事情都是困难的，而一切困难的事情又都是容易的。”<sup>⑤</sup>这个体会很有哲理性，也很有启发性。

莱布尼茨一辈子有三个“没有”：没有结婚，没有当过教授，没有进过教堂。人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 Lövenix，即“什么也不信的人”。<sup>⑥</sup>他病逝的时候，只有他的车夫或秘书陪伴在旁，没有牧师为他祈祷，没有教士为他送葬。

我曾与张祖贵合作撰写过莱布尼茨的传记，1992年收入吴文俊先生主编的《世界著名科学家传记》。1996年我们又写了一本更为详细的传记：《超越时代——哲人科学家莱布尼茨》（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然而还是感到难以把这样一位极不平凡的科学巨人有声有色地刻画出来。

① [德] 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涂纪亮译，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② [美] E. T. 贝尔：《数学精英》，徐源译，134、1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③ 葛力：《马克思为什么佩服莱布尼茨》，《党校科研信息》，1993年10月。

④ 葛力：《马克思为什么佩服莱布尼茨》，《党校科研信息》，1993年10月。

⑤ [德] 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涂纪亮译，16~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⑥ 陈修斋：《人类理智新论》译者前言：莱布尼茨及其哲学简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在为莱布尼茨写传记的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莱布尼茨原来还是17世纪欧洲的一位“中国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迷”。他对中国，特别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持续于他的整整一生，从弱冠时起，到古稀逝世，五十年间始终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当一批欧洲耶稣会传教士于明末清初来到中国以后，莱布尼茨曾对传教士们寄以厚望，期盼传教士们能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为使传教士们能够成为中欧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他煞费苦心作了种种坚持不懈的努力。

1697年，莱布尼茨利用传教士们的书信和报告，编辑出版了一部《中国新事萃编》(*Novissima Sinica*)<sup>①</sup>。我非常高兴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书库中看到了这部书，是1699年的第二版（原先珍藏于燕京大学图书馆）。这是一部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的书，莱布尼茨在为该书撰写的长篇绪论的开头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和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Tschina’（即“中国”）。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sup>②</sup>

在这篇长约八千字的绪论中，莱布尼茨表达了他的中国观，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尊重以及他对中欧文化各自优缺点的比较，还可以看到他执著热心地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是出自一种大思想家的宏伟眼光和广阔胸怀，是站在全地球的立场上，着眼于全人类的进步。

对于倡导中西文化交流，他的思想境界非常之高，然而从他与传教士们以及各方人士的交谈和通信中，又可以看出他对于如何实际地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特别在如何把中国的科学和文化传入欧洲的许多问题上考虑得十分具体和细致。莱布尼茨这种“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的学者风度和求实精神也使我很受感动。

莱布尼茨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光辉耀眼的科学巨星，他为什么重视中国，他怎样研究中国以及他怎样推动中西文化交流，这一直是我很感兴趣的课题。我曾就此发表过一些文章，如《莱布尼茨与中西文化交流》（1993），《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两大发现》（1995）等。

2000年夏，我利用去欧洲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机会，曾专程到德国汉诺

① 在中文文献中，本书曾有许多译名，如《中国新事》、《中国最新消息》、《中国最近事情》、《中国近讯》等，这里选用了谢扶雅的译名：《中国新事萃编》。

② 莱布尼茨：《中国近事》，梅谦立、杨保筠译，1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威市访问了莱布尼茨档案馆，在那里，我看到了莱布尼茨的许多手稿，看到了他亲手制作的手摇计算器，看到了白晋神父从北京寄给他的那幅《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的原件，看到了他在这幅图上亲笔注写的阿拉伯数字……那一天尽管天气阴沉，细雨绵绵，然而我受到了该馆赫尔伯特·布雷格（Herbert Breger）先生的热情接待。其后，我又找到了莱布尼茨的故居，找到了莱布尼茨与苏菲王后一面散步一面谈论哲学的皇家花园遗址，据说，正是在这里，看到树上掉下的落叶，莱布尼茨即兴提出了他的哲学名言：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2000年秋，我刚办完离休手续不久，收到乐黛云教授的约稿信，约我为她主编《中国文化进入西方文化主流》丛书写一本《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三年交稿。我当然有兴趣写这样主题的书，却又怕自己功底不足，资料不够，难以胜任。经乐黛云教授再一次的电话动员，又一次的当面劝说，我于2001年初应允了这一撰写任务。当时我想：第一，我退休了，虽然还在返聘之中，但是时间总会比过去充裕一些；第二，将自己多年来零星地、断续地积累起来的关于莱布尼茨的资料和认识，通过写作加以深化、细化和系统化，或许能够写出一本有一定特色的著作。

我希望写这本书时，首先要用比较简洁的文字描述莱布尼茨传奇式的一生及其主要的科学贡献，尽可能全面地刻画出他的特殊经历、特殊成就和特殊性格。我觉得了解了莱布尼茨的个性特点和学术特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他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奋力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具有的独特风格以及他所表达的一些独特见解。而且我感到，莱布尼茨的学术成长道路，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其次，要花一些笔墨叙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所发生的关于礼仪问题的激烈争论和尖锐斗争。因为，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才能理解莱布尼茨主编《中国新事萃编》一书的目的和内容，才能懂得在其《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一文中对于中国哲学所持有的观点和立场，才能知道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是以何种特殊方式进入欧洲的，又何以会进入欧洲思想主流，何以会对欧洲的启蒙运动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再有，我希望在这本书中能够进一步澄清某些误解和讹传。我深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相互之间都会有“误读”或“误解”。比如，莱布尼茨对于中国的《易》的理解就包含着相当多的误读，中国人对莱布尼茨也难免会有误解，于是就会产生一些讹传。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在我国多年流行着一种说法：莱布尼茨是受到中国《周易》“八卦”的影响才发明二进制